
目 录

绪论	1
第一章 清末西方教科书的传入	11
第一节 西方教育的传入	12
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13
二、洋务学堂的出现	18
三、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课程观	22
第二节 洋务学堂的西书	29
一、京师同文馆之译书	30
二、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之译书	36
三、洋务学堂西书的特点	43
第三节 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50
一、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成立	50
二、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的工作	52
第四节 编译西方教科书高潮的兴起	60
一、学习日本教育的热潮	60
二、国人编译教科书的热潮	65

二、新式学堂对西方教科书的广泛采用	72
第二章 清末的自编教科书	83
第一节 清末自编教科书的最初尝试	84
一、清末自编教科书的历史动因	85
二、南洋公学的《蒙学课本》	92
三、上海三等学堂的《字义教科书》	96
四、无锡三等公学堂的《蒙学读本》	99
五、上海澄衷学堂的《字课图说》	102
第二节 商务印书馆的自编教科书	105
一、商务印书馆编辑教科书的成绩	105
二、商务印书馆的教科书编纂者	114
三、为新式教育服务的编辑宗旨	120
四、推广与应用于社会的工作成效	124
第三节 其他的民间自编教科书	127
一、文明书局	128
二、中国图书公司	130
三、其他民营团体和个人的自编教科书	134
四、清末民间自编教科书的意义	138
第四节 清末的官办教科书	145
一、大学堂编书处	145
二、编译图书局	148
第五节 清末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158
一、清末教科书审定制度的确立	159
二、清末教科书审定的措施	166
三、清末审定教科书之效果分析	172
第三章 民国初期的自编教科书	191
第一节 民初教科书发展的新动力	192

第二节 辛亥革命后的自编教科书	198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教育理想	198
二、中华书局的崛起	203
三、商务印书馆的新动作	210
四、复古主义思潮下的教科书	217
第三节 新文化运动对教科书的促进	224
一、五四时期的课程改革思潮	224
二、新教育思潮与教科书的改进	235
三、国语运动与白话文教科书	243
第四节 民初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259
一、南京临时政府的教科书审定制度	259
二、各省图书审查会	263
三、北洋军阀政府的教科书审查制度	268
第五节 民国初期教科书发展的意义	280
结束语	301
附录一 中国近代教科书发展大事记	308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20
后记	323

绪 论

大约是1902年吧，或许还稍晚点，在商务印书馆的编译所内，张元济、高凤谦、蒋维乔、庄俞等人常常围坐在圆桌旁，热烈地讨论着《最新教科书》的编写事宜。据蒋维乔后来的《编辑小学教科书之回忆》中所言：

当时之圆桌会议，惟在《最新初小国文》著手之时讨论最详悉。第一、二册几乎每撰一课，皆讨论至无异义方定稿。至三、四册以后，则由各人依据原则自行起草，草成之后，再付讨论；亦有由一二人先行讨论者。尔时不乏有趣味之资料，如余编及某课时，用一“釜”字，而高梦旦必欲改为“鼎”字。余曰：“鼎字太古，不普通，不可用。”高曰：“鼎字乃日常所用之字，何谓不普通？”余曰：

“釜字如何不是日常所用之字？”于是二人大争，至于声色俱厉。及后细细分辨，方知闽语呼“釜”为“鼎”，而不呼为“釜”也。相与抚掌大笑。

这一幕距今已有 90 多年的时间了。但这些先生们的一丝不苟的治学精神，至今还让人油然而起一份钦佩之情。然而，他们工作的意义并不仅仅限于此。在《三字经》《百家姓》这些传统教材已经不能适应新式学堂发展需要的当时，是他们，以及其他许多的人，怀着敢为天下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毅然担负起了编辑新式教科书的任务。这一意义，或许这些当事人也未必有足够的认识，那就是他们正在开启着和推进着中国教科书近代化的进程。

所谓教科书近代化，意指教科书为适应近代新式教育的发展而产生的变革。它打破了两千多年来封建传统教材的格局，将资本主义发展所需要的教学内容引进教科书，并结合新学制而力图切合儿童的心理特点，使之朝着科学化和大众化的方向发展。近代教科书的这一变革，是由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所促成的。18 世纪工业革命之后，世界资本主义潮流由欧美而逐渐辐射全球。19 世纪中叶，英国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使中国封建统治者企图闭关锁国，与外界隔绝的希望化为泡影。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威胁下，近代中国人由御侮而求自强，而学习西方。由此而陆续兴办了第一批近代企业，创办了第一批新式学堂，第一次向外国派遣了留学生，第一次建立了近代海军。这些做法，导致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板块开始了缓慢的松动和变化。新的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也随之萌芽。从而开始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教科书的近代化就是这一历史进程

的产物。

当然，中国教科书近代化的帷幕并不是于1902年才拉开的。在这之前的25年——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第一次大会召开。为了满足日益增多的教会学校的教学需要，美国长老会的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指出：“教会学校的成败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是否拥有好的和适用的教科书。”于是，大会决定成立“益智书会”，即“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负责筹备一套初等学校课本。它不仅要供教会学校使用，而且也要着眼于让教会学校外的学生使用。这样，中国近代第一个编辑出版教科书的专门机构便正式诞生了。这一事件，标志着中国近代教科书的产生。“教科书”一词也因此流传开来。

这仅仅是对中国近代教科书产生的历史界定，但并不意味着中国近代教科书发源于此时。在这之前，不论是在教会学校，还是在洋务学堂，都已经存在着不同于中国传统经典的教科书，即由西方传入的语言教科书和自然科学教科书。只不过这些教科书还不规范，不普遍，不通行罢了。当然，这些事实都证明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首先是由西方教科书的传入而引发的。

确认这一事实之所以必要，是因为如果没有西方教科书的传入就没有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是因为如果没有对外开放的环境就没有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但是，承认这一先决条件，却不能因此认定，西方教科书的传入就是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因为任何一场社会性的变革，关键还是取决于事物本身的发展需要。如果其本身没有这种需要，任何外力的作用都是难

以奏效的。并且，教科书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尤其是作为一个民族对某种文化选择的体现物，它最终还是取决于本民族对某种文化的认可程度。因为在两种文化的悬殊对比中，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冲击固然是一种必然的趋势，然而一个民族也只有在能以本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去消解和容纳外来文化时，才能构成一种新的文化型态。因此，中国教科书的近代化，既来自西学东渐的作用力，也来自中华民族文化继承发展的作用力。

为了更清楚地说明近代教科书变革的必然性，我们有必要从课程和教科书发展的历史进程来加以论述。

课程是与人类教育与之俱来的。在原始时代，人类祖先为了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而学会了制造工具，为了加强生存的本领而掌握了火的运用，为了增进种群的协作而发展了语言，为了维系种的繁衍而逐步形成了婚配习惯及道德观念。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人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而这些根本的需要就成为远古时代人类社会教育的基本内容。用今天的话来说，制造工具、运用火、语言、道德习惯等就是原始社会教育的课程。教育内容与人类生存需要紧密相连，这是原始课程的突出特点。这也就是课程的本质。

随着人类文明的进步，课程的发展日趋专门化和正规化。在这一过程中，课程受到了两种因素的影响，那就是阶级的分化和学校的产生。社会统治者从本阶级的利益出发，将阶级统治的信条和价值观念都逐渐变成了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并通过学校而保存下来。统治阶级因享有教育的特权而达到垄断教育

的目的。这时的学校课程已不再是体现着人类的生存需要，而首先体现为统治阶级的生存需要。教育内容已由人类的生活本领而演变成统治阶级的统治本领。中国奴隶社会官学中的习射习礼教育，封建时代的六艺教育，以及古代欧洲的七艺教育，中世纪欧洲的宗教教育，都是这一特征的体现。学校教育内容与人类生活需要相分离，与人类生产劳动需要相脱节，与人的发展相悖离，表明课程发展偏离了它的本质而越来越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

这一格局的改变，首先来自欧洲。欧洲资本主义的崛起，使中世纪宗教教育受到冲击，神本主义课程体系先是为人文主义课程，继而为科学课程所取代；课程发展由传授统治术为核心开始向传授生产技术和促进人的发展为核心转化。被誉为“现代科学之父”的培根最早喊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 1592—1670）继承了这一思想，强调了现实世界的各种知识都是有用的，都应该包括在课程内，并系统阐述了“把一切事物交给一切人”的课程理想。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1903）接着发表了《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以生物进化论为理论基础，提出了功用课程思想。他认为：生产过程既然那么快地科学化，“科学知识就应该同样地成为每人所必需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因而他主张生理学、数学、力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天文学、地质学都应该成为学校课程。他的这一主张成为人类现代课程意识的开端。数代资产阶级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不仅确立了科学课程的地位，而且催发了新的人文课程，使课程发展再次回到为生产服务、为人类服务这一轨道

上。这是一种新层次新水平的课程本质复归，它体现了历史的必然，也体现了历史的进步。

在中国，处在同一时间轨迹上的明清王朝，课程的发展不仅没有跟上这一时代潮流，反而在封建专制制度的阻碍下，向背离课程本质的方向愈走愈远。程朱理学成为传统课程的灵魂，“存天理，灭人欲”成为传统教育的根本目标。由是，传统课程体系所体现的文化传统只剩下一副僵死的外壳，原始儒学中所蕴含的创造活力为封闭保守、固步自封、愚昧专制等陋习劣俗所窒息。封建士子唯习八股术，奉程朱理学为圭臬，蝇营狗苟，亦步亦趋，成为食古不化的“考癖”。整个知识群体乃至整个民族文化视野的保守性和狭隘性突出地显露出来，传统的进取精神丧失殆尽。以致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对外来文化的排异性空前膨胀，中国文化的内部更新机制极度萎缩，导致了中国文化的衰败与落后。这些事实表明，明清时期的课程发展已经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它的空疏无用为越来越多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所唾弃。于是，课程的本质复归就同样成为中国课程发展的历史必然，只不过直到近代社会才使这一变革获得实现的条件。

教科书近代化的含义就是在这一背景下界定的。作为课程的体现物，教科书要能满足人类的生存需要，起码应具备两个本质特征。首先，它应该大众化。就是说教科书应该是反映人类生产和生活需要的知识载体，应该是社会全体成员学习生活的工具，应该是以通俗晓畅的形式阐述人类文明，启迪人们智慧的精神食粮。一句话，它必须是面向大众的。其次，它应该科学化。教科书作为学校教与学的矛盾长期相互作用而产生并

发展起来的一种特殊知识载体，它具有内容的系统关联性，内容结构的规定性、渐进性和具体内容的科学性、经典性、先进性等属性，任何一套教科书的成功，都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属性才被社会所认可，所接受的。因此，教科书的内容必须是宣扬科学的，必须是为人类进步服务的。而且，教科书的编排也必须是科学的，它既要考虑到如何对某一门学科的知识形成一条系统、完整的知识链，又要考虑到在所有学科之间形成一个有机的知识网络，还要考虑到受教育者在各年龄阶段的生理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才能收到循序渐进、春风化雨的教育效果。

但是，中国的传统教材却背离了这两个本质特征。从历史来看，教科书的产生晚于课程。因为教科书的构成必须要有三个条件：一个是文字；一个是文字赖以显现的物质载体，如甲骨、木、竹、帛、纸等；还有一个是教科书使用的范围和场所，那就是学校。这三个条件决定了教科书自它产生之日起，就主要是在体现着封建统治者的意志和需要了。中国古代虽然曾经出现过如《九章算术》之类的反映人类生产经验的教材，但它们在传统教材中的地位并不重要。封建传统教材的主体是传授统治术的儒家经典及法律诰文，以及由此衍生的启蒙教材。从西周的“六艺”教材体系，到孔子的“六艺”教材体系，再到封建时代以儒家经典为中心的教材体系，都是以培养统治人才为宗旨的。即使是蒙养教材也脱不开这一内核。对此，吴研因在《清末以来我国小学教科书概观》中曾有过这样的评价：

清朝末年学校没有兴办以前，我国的儿童读物，大约分两种：一种是启蒙的，例如《三字经》、《百家姓》、《千

字文》、《神童诗》、《千家诗》、《日用杂字书》、《日记故事》、《幼学》等；一种是预备应科举的考试的，例如《四书》、《五经》、《史鉴》、《古文辞》之类。这些读物，有的没有教育的意义，有的陈义过高，不合儿童生活。而且文字都很艰深，教学时除了死读死背诵之外，也不能让儿童们明了到底读的是些什么。儿童读这些书，一定要花上七八年的工夫，读得烂熟了，再由老师开讲，然后才渐渐地明白一点字义跟文句，至于圣贤的大道理，往往读了一辈子，读到老死，也读不出什么来；固然从这些读本读起，再读下去也会读出几个所谓“通儒”来，但是一则成功的只是少数的天才，一则这些少数的天才也往往书读通了，天才也成为废才弃才了！这些废才弃才，有的迂腐昏庸不辨粟麦，有的狂妄放肆不近人情。

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传统教材的本质是非大众化的。它没有关于人类社会生产的知识，它缺乏人类社会生活知识和技能的内容。它的形式艰深古奥，不为大众理解和接受。这一特质是封建统治者垄断教育垄断文化的产物，是为愚民政策和封建专制服务的。

由此而体现的另一个特征，就是传统教材的本质是非科学的。首先，传统教材中没有科学的地位。它排斥了自然科学的教育内容。即使是人文主义教育内容，也充满着迷信的、封建的、落后的、唯心的东西。那套“天人感应”、“天理至上”的封建信条成为传统教材的灵魂，使传统教材成为宣传愚昧专制的经典读本。我们并不否认历代传统教材也注意了吸收古代科学的成果，但这些成果都被用来作为宣传封建意识的工具，作

为论证封建专制永恒的依据了。而且，传统教材中所含有的这些科学因素也多是停留在经验论的水平上，并不是由真正意义上的科学思辨而得出的结论。其次，传统教材的编排也是非科学的。虽然有的传统教材的编排也注意了内容的深浅关系，到封建社会后期也区分了启蒙阶段和科举阶段的不同，在教学上也强调了“不陵节而施”即循序渐进的原则。但由于传统教育学制的不严格，因而教材的结构也并没有严格的规定性和渐进性。该读什么或不该读什么，并没有依据人的心理特征和认识规律。尤其是封建社会中章句之学的盛行，更是把经典读本中本身蕴涵的内在结构弄得支离破碎，把儒家经典中“经世致用”的精神丧失殆尽，使传统教材成为培养废才弃才的读物。

当然，我们并不是全盘否定中国的传统教材。在古代社会中，启蒙教材的编写方法还是有许多值得称道的地方。比如多用韵语，便于吟诵和记忆，注意采集故事，力求生动且富于形象性等，都是十分切合儿童年龄特点的。而且，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教育科学也自然受其制约而难于发展。教育内容更是不可能超越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也就是说，传统教材的存在有着它的历史正当性和合理性，它的编写经验有许多还值得我们今天进一步认识和借鉴。但是，传统教材的非大众化和非科学化的本质是严重背离教科书本身的特质的。在封建专制主义的不断强化下，它不仅无助于人类社会的进步，相反，越来越成为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的桎梏。郑振铎先生在《中国儿童读物的分析》一文中曾对此有过激烈的评价。他认为这类童蒙教材“以严格的文字和音韵的技术上的修养来消磨‘天下豪杰’不羁的雄心和反抗的意志，以莫测高深的道学家的哲学和

人生观，来统辖茫无所知的儿童”。这个评价多少是切中了要害的。

随着中国社会近代化进程的深入，传统教材的腐朽性和空疏性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它的非大众化和非科学化的本质与社会发展的矛盾越来越尖锐。特别是因为大工业生产的基础是科学技术，它超越了手工生产和个人的具体经验，使人类只有通过专门的学习才能掌握这些技术，这就必然要求教育迅速适应这一发展需要，教科书的变革也就成为必然。因此，教科书如何面向大众，面向科学，面向生产，面向生活，就成为教科书近代化的首要课题。

由此看来，教科书的近代化是教科书本身发展的需要，是近代社会变革的需要。尽管中国社会的近代化主要是由于外界强大的压力而作出的被动反应，外来因素在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中显得十分重要，但中国变革的内在需要则是主要的。认清这一点，我们就能正确把握教科书近代化的基本出发点。

第一章 清末西方教科书的传入

教科书的近代化是由于西方教科书的传入而起步的。

近代中国人面对突兀而至的社会变革潮流，接受西方教科书以填补暂时的空白，是近代教科书发展的历史必然。但这一必然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作为一种文化选择的体现物，西方教科书的传入受到了两方面因素的制约。一方面，它受到了西方传教士的传教需要的影响；另一方面，它又受到了近代中国人的西学观的支配。后一种因素显得更为重要。因为一种不同于传统，有悖于封建国情的新式教科书能否在清朝中国站住脚，更主要视近代中国人对其容忍的程度。这一程度的变换，

又取决于近代教育改革的深入。所以，在清末，西方教科书的传入可以以中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教科书是被动的，消极的，敷衍的。这一时期传入的教科书数量少，适应面窄，其来源以欧美国家为主，译介者主要是西方传教士，以及为数不多的士大夫。后一阶段，近代中国人接受西方教科书是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这一时期传入的教科书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与前一阶段不可同日而语。其来源以日本为主，译介者主要是中国的民间团体和广大的知识分子。这一历程的演进，对于推动清末的教育改革，对于推动自编教科书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第一节 西方教育的传入

从教科书发展的角度看，近代教科书的产生至少需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是西学的传入。这里讲的西学，是广义上的西学，它不仅包括西方文明中的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还包括西方教育科学知识。正是这些新鲜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观念的输入，才促成了近代教科书的产生。第二是新式学堂的创建。如果新式教科书没有一个容身之所，没有一个用武之地，它的存在和发展也就没有了希望。应该说，这两项条件都是必要条件，都是缺一不可的。

一、西方传教士的东来

从历史来看，西方教育的传入并不开端于近代。早在明清之际，罗马天主教耶稣会士来华，就带来了大量的西书、西器和西图，掀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传播西方文化的热潮。这其中，就包括了西方的教育科学和教科书。

这些介绍西方教育知识的书籍，第一次向中国人介绍了西方教育的概况。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io Aleni, 1582—1649）写的《西学凡》，就较系统地介绍了西方教育制度，尤其是欧洲大学所设专业、课程大纲、教学过程、教学方法和考试等方面的知识。《四库全书提要》称此书为“所述皆其国建学育才之法”，并由李之藻收入其所编的《天学初函》一书中。艾儒略的另一本系统介绍五大洲地理的专著《职方外纪》，其中也介绍了西方各级学校的设置、规模、学习年限、课程、考试方法和教师资格等内容。另外，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Alphonse Vagnoni, 1566—1640）的《童幼教育》，则是第一本由西方传入的教育理论专著。全书分上、下两卷，上卷分教育之原、育之功、教之主、教之助、教之法、教之翼、学之始、学之次、洁身、知耻等节；下卷分缄默、言信、文字、正书、西学、饮食、衣裳、交友、闲戏等节，从多方面阐述了儿童教育的理论。此书亦被列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另外，当时西方大学通用的教材，有许多也被翻译引进。例如堪称欧洲历史上第一部伟大的数学典籍《几何原本》（前六卷），就是经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口授，徐光启笔录而介绍到中国来的。该书由利玛窦、

徐光启二人反复订正，三易其稿，被《四库全书提要》称之为“西学之弁冠”，并收入《天学初函》。另两本由利玛窦口授，李之藻笔录的《同文算指》十卷和《浑盖通宪图说》六卷，则是利氏的老师在罗马大学任教时的讲义。这两本书都被收入《天学初函》。此外，当时被译成中文的《灵言蠡勺》二卷，《寰有诠》六卷，《修身西学》五卷，《名理探》十卷等书都是葡萄牙哥应拔大学的讲义。

但是，明清之际这些宣传西方教育的动作并没有汇成一股新潮流。其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当时还没有这种社会需要。明清时期，虽然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中国社会内部变革的需要并不强烈和迫切；封建专制统治占有绝对优势，外来影响对中国封建制度还不足以构成威胁；加之笼罩在封建知识群体的文化氛围充满着愚昧和盲目自大的空气，传统教育价值观念根深蒂固，西方的科学教育思潮在中国反响极微；而且，西方耶稣会士来华的主要目的是传教，对教育变革并无倾注更多的精力。因而，在当时不可能也没有产生出教育变革的需要。

学习西方教育的需要是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之后才真正产生的。英国侵略者用炮舰轰开了中国的大门，打破了封建士大夫“天朝上国”的迷梦。近代中国人因耻辱而萌发了危机感，因落后而产生了变法图强的愿望，由此而产生了教育变革的需要。

从内部因素看，近代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求救国之策时，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变革的重要性。从魏源的“师夷长技以制